

# 意識與行動

## 婦女／性別研究建制化歷程之個案研究

陳佩英（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

---

### 研究主題

很高興《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願意評論我的新書 *Acting 'otherwis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omen's/gender studies in Taiwan's universities* (2004)。因為該書是英文寫作，一般讀者不易在坊間購得此書，應書評主編成令方的邀約，在此介紹這本書。

記得在美國口試時，外系口試委員希望能看到我從事這個研究的動機、研究過程、及結果的一些感言，作為日後出書的最後一章。她的理由是，女性主義研究往往使研究者自身改變，因為牽涉到生命經驗的互動和對話，意識的轉變也在對話中完成。由於時間緊迫，我仍未能及時完成寫在書中。趁此機會，我想把研究過程中的心得與感想做一個交代。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 *Acting 'otherwise'* 這本書的章節安排。該書共分八章。第一章介紹台灣與各國婦女研究的發展，並說明本研究的重要性和主要研究方法。第二章分成兩部分，前半部整理大學女學生、研究生和女學者受到性別歧視的經驗，並說明這些特殊經驗如何構成女性潛在的社會行動基礎，同時透過文獻探討，整理婦女研究相關的理論和研究取徑；後半部則介紹微觀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方法，以

「開路先鋒」概念統合行動者的意識、認同、和行動策略，作為解釋開路先鋒行動與婦女研究在大專院校建制化歷程的互動關係。第三章先交代台灣社會的時代脈絡、政治背景與高等教育的組織文化，接著說明早期婦女研究的課程與研究中心是如何在大學出現和發展起來。第四章描述和分析從事婦女／性別研究的男女學者，如何在成長背景、求學生活、求職和工作等經驗中察覺到制度性的性別歧視，並發展出新的身分認同和選擇投入婦女研究。第五章和第六章以玉山大學和福爾摩沙大學（均為假名）作為個案研究的場域，探討開路先鋒學者如何在不同資源與條件下，採取了哪些行動策略，在此兩所大學裡開創、持續推展婦女／性別的教學與研究。第七章進一步探討、詮釋身分認同行動與婦女研究建制化之間的關係。最後一章總結了本研究的發現，並將台灣的女性主義行動連結到全球婦女研究的行動意義裡。

我的研究表現於兩條軸線，一是觀察作為弱勢的婦女／性別研究在學院中展開的歷程，另一是分析組織與制度的變遷如何在性別研究開路先鋒者的集體行動中發生。身分認同與行動策略作為兩個主要的結點，聯繫了這兩個軸線，構成歷史社會學中的微觀研究方法，透過顯影「開路先鋒」的意識與行動相互印證的歷程，我說明了女性主義學者如何在多元身分認同的交戰中，運用不同的策略取向（培力、連結與抗衡），在原本結構的層層制約中尋找可以行動的隙縫，嘗試在「可能性」之中尋求突破、轉化與開展，使婦女／性別研究在校園內逐漸發展起來。這些開路先鋒的反思與實踐，顯影了行動與結構的互動關係。

我從以下兩部分來說明我的研究心得，第一部分牽涉到整個研究架構的形成過程，第二部分我想談談我如何把受訪者的生命經驗轉變

成研究結果的討論與詮釋。

## 研究的詮釋架構

我開始接觸女性主義是從博士班開始的，沉浸於西方多元文化論述、白人和美國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理論之後，開始轉向探索女性主義在我所成長的台灣社會如何發展起來。我的研究核心問題在於探討這個新興領域如何在台灣生根和轉化，以及它未來的可能性在哪裡。最令我好奇的，不僅是這個跨科際的學術領域如何進到學院，我想知道的是，哪些女性先覺學者投入了婦女運動和婦女研究的行列，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思考和採取行動，用什麼策略去解構和重新建構性別和女性主體的意涵，以及與之相關的知識轉化，而這些人的參與又如何決定了婦女／性別研究的發展和它未來的可能方向。

回溯 1980 年代，當時的社會條件並不有利於新思想的引進，雖然呂秀蓮於 1974 年出版了《新女性主義》，《婦女新知》雜誌社也在 1982 年成立，但是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任何有關新的思想運動都極為容易被掛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台灣當時處於政治戒嚴時期，大學的思想控制本來就很嚴密，學院知識仍堅守著門戶之見，而 1985 年全國的女教授只占教授總人數的百分之八等等，這些結構因素使得女性主義進入校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當時研究是配合政策的主流觀點，以國家發展與社會和諧作為研究議題，和婦女有關的研究自然被視為婆婆媽媽、不重要的事，或者只有影響到國家發展時才被政府和學術圈所重視；再者，在量化研究典範的規範下，「婦女」常被視為是一個被研究的「變項」而不是發聲的「主體」，這些現象說明知識與權力相互構成的關係。傳統知識的守門員又以男性學者為

主，女人因此被當作是知識的內容而不是知識的生產者，加上女性身分與知識分子的角色是相互矛盾的，女性又如何能夠率先帶領新思想的引進呢？更遑論由她們來領軍去開拓新的領域。

在此脈絡下，研究女性學者的身分認同，等於是揭開知識和權力的共構關係。但是我的研究興趣不在於揭露男流中心的知識生產，或是這樣的知識權力關係如何建構了帶有性別歧視的社會現實，並因此複製了性別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我想問的是，在各種緊密的權力關係當中，這些「開路先鋒」如何還可以找到隙縫（粗體為作者所加），作為解構和重新建構知識的可能性，也就是把重點放在探討行動的知識轉化歷程。我從各類理論當中，嘗試找到將認同行動和制度變遷之間的關係架構起來，以行動者的能動性作為價值轉換和知識建構之間的連結。

我以三個面向來界定行動者的能動性：意識轉換、身分認同、行動策略。其中行動策略是將意識認同和制度變遷之間的關係連結起來。行動者評估結構中的組織資源、社會資源、與文化資源，尋找可以讓婦女研究棲身的地方、以此為據點進一步開拓它的發展空間，並藉由學院的正當性來建構和傳遞新的知識，把個體新的認同價值融入知識的轉化之中。需要說明的是，結構在此研究被當作是與「知識行動之可能性」相關的條件、資源和場域；例如組織資源指的是組織架構、運作的邏輯、和獎懲規則，社會資源包括聚集志同道合的夥伴和支持者，而文化資源包括傳統價值、被接受的思想或新知識的建構等。行動者在隙縫中尋找可資利用的資源和「言說」，甚至是創造新的資源和行動論述，促使個體的或集體的行動成為可能。

剛開始時，我圍繞在 Dorothy E. Smith、Anthony Giddens、Pierre Bourdieu、Michel Foucault、Judith Butler、Henry Giroux、

Basil Bernstein、Antonio Gramsci、Alain Tourain 等學者的思想，嘗試找到主要的研究理論依據；後來我又想從新制度論、新社會運動理論及婦女運動、馬克斯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識論和立足點、女性的主體性、後學女性主義、美國非白人女性主義等這些理論當中，尋找研究的立論基礎。<sup>1</sup> 大範圍涉獵了好一陣子，卻仍然無法滿意。不過，在探詢和大量閱讀的過程當中，提昇了我對論述選用的敏感度，也開始反省文化借用的困境。在徬徨不知所措時，也逐漸體會到許多系統化理論的侷限，若要以我的研究問題為主，想要找到一個理論去詮釋那跨越或穿透性別、族群、地域、時代界線的社會現象，似乎顯得困難，這些理論也無法貼切地彰顯特殊經驗的深層結構、或讓特殊經驗可以和理論對話、活化系統理論的解釋。

我同時也搜羅了所有國內外相關的婦女／性別研究的發展，從比較的觀點去了解婦女／性別研究的演進，從中定位台灣婦女／性別研究發展的位置；另外我也嘗試從女性主義的組織理論裡，找到可以探討組織變遷的詮釋觀點。然而這些描述性的報導或分析，有著不同的研究觀點，很難找到共同的架構來囊括說明並做跨國性的比較；加上女性主義的組織理論又過於抽象，難以落實到現象本身做深入分析。

---

1 新制度論的學者有 Paul DiMaggio 與 Walter Powell；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學者有 Alberto Melucci、Verta Taylor 和 Nancy Whittier；馬克斯女性主義的學者則有 Kathleen Weiler、Zillah Eisenstein、Catharine MacKinnon；女性主義認識論和立足點相關的學者有 Nancy Hartsock、Teresa de Lauretis、Donna Jeanne Haraway、Sandra Harding、Kathy Ferguson；談論女性主體性的學者有 Simone de Beauvoir、Susan Hekman、Maureen Manhoney、Kathi Weeks；後學女性主義的學者有 Seyla Benhabib、Maznah Mohamad、Chandra Mohanty、Louise Morley、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而美國非白人女性主義的學者有 bell hooks、Patricia Hill Collins、Anzaldúa Gloria、Chandra Sandoval 等。

於是我轉而尋找「後設架構」(metamodelization) (McKenzie, 2001)，以一個還不太系統化的概念軸線，作為這個研究的詮釋架構，並把具有解釋力的各種理論，作為建築這個架構的磚塊，去支撐起個人行動和知識轉化之間的動態關係。這個架構嘗試將「意識—身分認同—策略行動」的主體能動性意義，作為顯影行動與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也就是去解釋行動如何轉化知識，而知識又如何進一步轉化了行動的可能性。我參考了 Philip Abrams、Barbara Laslett 及其他相關研究之後 (Patricia Gumpert、Flora Pearle McMartin、Ellen Messer-Davidow、Shirley Jean Miske、Florence Howe、Patrice McDermott)，決定以微觀基礎的社會學研究 (microfoundational approach)、或生成的社會學研究旨趣 (sociology of becoming)，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sup>2</sup>

## 婦女／性別研究的認同實踐

透過研究結果的解說、分析和詮釋，使得台灣的婦女／性別研究也可以和其他國家的婦女研究對話，從中比較、探討這個跨科際和跨文化的領域在各個社會的進展狀況。婦女研究在各國的開展，代表了全球女性以知識運動來重新建構女性的主體性，去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我在鋪陳歷史背景和討論個別受訪者的遭遇時，往往在年

2 這看似平常的研究架構和取徑，反而受到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書商的審查學者、以及美國比較和國際教育學會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論文審查委員的肯定，認為這個詮釋架構極具原創性，可以把地方行動和全球的女性主義發展做連結。美國比較和國際教育學會因此將這本論文評選為 2003 年的年度傑出論文 (Gail Kelly Awards Outstanding Dissertation, 2003)。

代長短、事件解釋的範圍和程度等因素的考慮中拉扯，難以取捨，從中我了解到寫作本身就是政治，給國外和本國的讀者在歷史背景的交代上就會不一樣，所要呈現的重點和面貌也有所不同。因此，口試委員表示，雖然她們不認識台灣，但讀起台灣女性主義學者的奮鬥史，仍然感受得到那個時代的召喚，以及心有戚戚焉的共鳴感。

從參訪從事婦女研究和性別研究的學者，我慢慢領會到她們代表了不同時代的機會和可能性，因為所處的結構條件不同，碰撞主流價值的回彈力量也有所差異，婦女研究在不同大學的出現、和在不同時期的進展也就有所不同。結構因素加上個別學者的差異性，網織了一個複雜、多層次、和變動的意識轉變、身分認同、行動策略的複合體，我把這些因素統合在「開路先鋒」行動者的身上，以身分認同作為引導行動方向的羅盤和吸引人才聚集的磁鐵，這些作用顯示在我們所看到的婦女研究進入體制的顛簸歷程。

我選擇了兩所大學作為觀察和探討的對象，並以深度訪談為主要資料的蒐集方式。<sup>3</sup> 我還參考其他相關資料，了解和掌握台灣社會和學術的發展。<sup>4</sup> 轉成逐字稿的訪談紀錄，經過分類編碼及與文獻的來回對話之後，分成了三個主題來討論：女性主義學者的生成歷程、教學與研究作為認同行動、認同行動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係。

---

3 我總共訪問了三十五位學者，其中的三十一位是從事婦女研究或自認為是女性主義學者（當中包括了這兩所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的主任、職員和研究員），在這三十一位當中有七位是男性學者。其餘的四位當中，有三位在教育部任職，另一位則是已經離職的台灣亞洲協會重要核心成員。訪談的時間從三十分鐘至六個小時，平均每人一個半小時。

4 這些資料含括了相關的統計數字、教育部與高等教育文獻、婦女研究課程發展、相關教師經歷、學生人數、婦女研究中心的預算、會議紀錄、期刊、論文、書籍，還有女性主義學者及研究生的相關論文等。

研究結果分成三部分來談，第一部分描繪受訪學者接觸和成為婦女研究學者的關鍵歷程。認同的建構本身其實是一個發現之旅。在訪談中，絕大多數「開路先鋒」學者承認在過去某個重要時刻，「找到」了女性主義。多半學者認同女性主義價值是透過深度閱讀、教學、從事婦女研究及參與婦女運動而建立。

第二部分討論開路先鋒學者如何在兩所大學裏創立和推動婦女／性別研究。雖然兩所大學的組織特色和組織文化不盡相同，整體的發展策略也有所差異，然而畢竟處於解嚴前後，社會和大學的結構基本上限制了策略的選擇範圍，也就是可找到的機會和條件是差不多的。例如，婦女研究中心剛開始的運作費用是由亞洲協會支援，由此才能夠順利獲得成立，並繞過大學的直接控制；早期幾乎都以「婦女」和「兩性」命名研究室，「女性主義」或「性別」遲至 1995 年以後才正式成為組織或課程名稱；通識教育課程成為早期推廣婦女研究課程的綠洲。

兩所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的經常性活動以靜態演講、座談會、出版刊物、以整合型研究計劃來做課程規劃與發展、及舉辦大型研討會為主。1995 年以後，性別研究議題和參與人數大幅增加，其他學校的性別研究室和研究所相繼成立，然而兩所大學的婦女研究中心卻面臨尋找新資源來維持組織的正常運作、深化性別研究教學、發展婦女研究學程，以及提昇婦女研究學術地位等種種的挑戰。

第三部分則深入討論「認同作為行動」和「行動作為認同」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把認同行動和制度的變遷在詮釋上加以連結。「認同作為行動」指的是發現與認同女性主義之旅。Weeks (1998) 認為認同行動反映的是女性主義價值的一再選擇與實踐，並稱之為「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sup>5</sup> 此原則同時限制和培力了「開路先鋒」，個體

以意志不斷回歸女性主義價值的選擇當中，創造了認同行動與社會生成的接合點，而個體的身分認同也是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具現與生成。

至於「行動作為認同」部分的討論，我提出了三個行動策略的主要取向——培力、網絡、抗衡，作為連結個體身分認同價值和制度變遷。雖然這三個取向相互交疊發展，但為了分析和說明，我刻意在發展的過程中賦予不同的重點。

「培力」是指在早期「開路先鋒」透過成立一個另類空間，來獲得教學與研究初步的正當性。即以實體的據點來聚集有相同興趣的學者與研究生，並舉辦學術活動，使婦女研究得以維持並逐步成長。

「網絡」的連結指的是透過集結資源與人力累積社會資本。對弱勢團體來說，發展組織網絡是啟動社會行動的重要策略。

「抗衡」展現的是溫和的「主張」，與差異認同政治的張力關係。「主張」策略講求遊說而不是直接衝撞權力；而張力關係源自身分認同界線的劃分，反映的是社會和學院是否接受女性主義，婦運和婦女／性別研究的交互作用，婦女研究、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三者之間的集體認同關係，以及男性學者從事性別研究的身分認同問題。核心的問題是：女性主義的身分認同基礎是什麼？誰具有正當性去定義婦女／性別研究，以及哪些推動策略可以拓展婦女／性別研究的未來。

- 
- 5 「永恆的回歸」(eternal return) 為尼采所創，意指「重覆」，只是重覆中不含相同的因素，「重覆」代表的是一個例外，一種僭越 (transgression) 和一種差異 (difference)。Weeks 挪用尼采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 創造性面向的定義，並結合 Deleuze 的說法，將 eternal return 定義為行動的原則，選取可以積極創作的行動來肯定生命的活力，並排除那些引起反動或擦起虛無感的選擇或行為。詳細的討論見：Weeks (1998: 40-43)。

## 婦女／性別研究的未來

由於篇幅關係，我無法在此深入探討主張性別平等的個別學者如何在結構的隙縫中，採取不同的策略行動來開展和促進婦女／性別研究的發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此書或已經發表的期刊和研討會論文。<sup>6</sup> 最後我僅針對兩個重要的議題提出我的觀察。

### (一) 婦運和婦研的分與合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身分認同的社會運動具有兩面刃的效應，一方面它可以「培力」個體一起發聲和行動，另一方面差異認同政治也隱伏了衝突的張力和分裂的可能性。在 1990 年初，婦運和婦研之間，因為對於婦女研究所扮演的社會功能和階段性任務的期待不同，加上推動策略的想像也不一樣，婦運學者公開批評並反對早期婦女研究的含糊界定，形成婦運和婦研的第一期緊張關係。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主張婦女福利和「性自主」兩個陣營，因為性別政治認同和運動策略的差異而產生了第二期的緊張關係。<sup>7</sup>

---

6 期刊論文請參考：陳佩英（2002）〈意識與行動：台灣婦女／性別研究建制化歷程之探討〉，《通識教育季刊》，11(3 & 4): 34-70；或兩篇研討會論文：〈進退迴旋的認同實踐——以性別研究建制化為例〉發表於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主辦的「兩性教育學術研討會」，2004 年 8 月 23-24 日；另一篇則是〈認同實踐與知識轉化——以一所大學的性別研究建制化為例〉，發表於由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與性別研究組主辦的「亞太地區性別平等教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2004 年 11 月 25 日。

7 1980 年末期，婦運界開始公開討論婦女研究與本土婦女運動之關係。婦運領袖認為婦女研究不能脫離婦女運動的滋養，而婦研學者則認為，婦研、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是三個彼此部分重疊的領域。這是第一期的張力關係，第二期則

第一期的緊張關係促成了「台灣女性學學會」（簡稱「女學會」）的成立，女學會的宗旨之一便是要融合婦女運動於教學和研究當中，然而社會運動畢竟和學院內「知識轉型」運動的場域與條件都不同，後者的女性學者至少面對的是外人內置（outsider within）、以及男流中心的知識典範兩種處境。到底女性主義學者是否能兼顧「內外」，促成婦運和婦研的發展，值得進一步的觀察與討論。

這種一肩挑的處境也反映在美國的學術界。例如重要的女性主義期刊 *Signs* 的創辦者 Catharine R. Stimpson 選擇進入學院而不是與社運結合，並以高標準要求提昇女性主義研究的學術發表，因此奠定了婦女研究知識生產的學術地位（McDermott, 1994）。1990 年代的美國女性主義學者面對學院內外的反挫力，<sup>8</sup> 也重新檢視和修正婦女研究作為「婦女運動的學術力量」（the academic arm of the women's movement）的運動口號，這些女性學者發現，婦女研究即使經過了三十年的發展，仍只是學術界的跛腳領域，因為它的發展同時受到差異認同政治的牽絆和學院政治的限制，因而呼籲眾婦女研究學者一起正視婦研未來發展（Allen, 1997）。然而學院化之後的婦女研究，缺乏與婦運連結，也就失去了滋養它成長茁壯的政治推動力，以及將之轉化為知識的經驗土壤。目前台灣女性主義學者是否也處於類似的情

---

發生在 1995 年以後。關於第一期的界定議題的討論，請見《婦女新知》1986 年第 53 期和《婦女研究通訊》1992 年第 25 期。有關第二期衝突的發展始末請見《婦女新知》1995 年第 145、152-163 期；1997 年的 182、183 期；1998 年的 186 期；以及《當代》雜誌 1998 年第 127 期相關之內容。

- 8 例如 Christina H. Sommers (1995) 批判女性主義學者為狂熱和極端者，在大學裏宣揚排除男性的另一種性別歧視，破壞了真正平等的主張。同時，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抬頭也不斷批評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並減少婦女研究的預算（Messer-Davidow, 2002）。

境，台灣是否需要模仿或甚至走和西方婦女研究發展一樣的路線，仍然需要台灣參與者的思辯、討論、並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 （二）婦研未來的發展

有關台灣婦女／性別研究的未來，在受訪的學者當中，有的主張在各個學門裏「就地革命」或「到處撒種」，有的主張婦女研究應該「自成一家」，例如設立性別學系或研究所，更有的以為建立一個女性主義的知識運動團體，將知識轉化作為運動策略，也把運動的議題由學院外轉向學院內，尤其在提昇婦女／性別研究的品質上更需要努力，使得婦女研究不再被冠上政治正確而缺乏學術價值。女學會或其他的性別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可否擔負起深化教學和提昇婦女研究學術價值的責任，以及運用什麼樣的形式和策略來推動，值得大家進一步集思廣益。

在美國，Patricia J. Gumport 於 1987 年完成婦女研究的博士論文，之後她在兩篇期刊論文中主張，建立知識生產的據點，也就是以建立培育新生代和薪火相傳的學院正式組織，來抗衡傳統學門，並維持和促進這個領域的永續發展。她呼籲女性主義學者需要把婦女研究當作「志業」，以熱誠和堅信的行動投入教學與研究，才能建構這個新興領域並且面對來自傳統學門的各種嚴峻挑戰（Gumport, 1990, 1991）。另外，也有學者認為，跨科際（interdisciplinary, transdisciplinary）的知識論和方法論也需要發展起來，才能累積和提昇婦女研究學術的正當性（Klein, 1996）。

## 結 語

面對眾聲喧嘩的社運和學運界，婦女研究到底應該專注於發展論述並從事教學與研究，還是與婦運界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仍然挑戰著女性主義學者的身分認同和行動的選擇。我的口試委員表達了她們對台灣女性知識分子的敬意，其中一位擔任婦女研究中心的主任感嘆道，美國的婦女研究經過學院化、知識化之後，由於受到預算分配和獎懲制度的限制，學域發展更為窄化，只見各種論述生產和研討會上唇槍舌戰的辯論，看不到學者的行動熱誠與活力；而台灣的婦女研究發展經驗仍然這般生機蓬勃，學術活動充滿著社會行動力，台灣學者艱困的努力，讓她們回憶起過去的奮鬥和孕育她們生命的行動力。

到底，婦女／性別研究的未來繫於行動力、學術價值，或是兩者的交互作用，是這一代女性主義學者不能迴避的課題。

最後，我在此感謝所有接受訪問的學者，從與她／他們的經驗相遇、閱讀和對話當中，我也聽到了自身內心最深層的呼喚；在書寫的過程中，我再一次經歷了意識提昇、身分認同的轉換，這一次不是來自書本中的話語，而是那活生生的經驗知識。從中，我體會到每個經驗底層的反思，滋養了行動的生命力，並活化了知識的論述，更打動了每個不願意和經驗異化的研究者，一起加入知識賦予生命價值的實踐行列。

## 參考文獻

- 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印（1985）《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文集》。
- 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1992）《婦女研究通訊》，第25期。
- 呂秀蓮（1974）《新女性主義》。台北：幼獅。
- 胡幼慧（1992）〈「婦女研究」再研究：一些質疑和反思〉，《婦女研究通訊》，25: 7-8。
- 婦女新知編輯部（1986）《婦女新知》，53期。
- 婦女新知編輯部（1991）《婦女新知》，111期。
- 婦女新知編輯部（1995）《婦女新知》，145、152-163期。
- 婦女新知編輯部（1996）《婦女新知》，174期。
- 婦女新知編輯部（1997）《婦女新知》，182、183期。
- 婦女新知編輯部（1998）《婦女新知》，186期。
- 陳佩英（2004）〈意識與行動——婦女與性／別研究建制化歷程之探討〉，《通識教育季刊》，11(3&4): 37-70。
- 陳佩英（2004年8月23日）〈進退迴旋的認同實踐——以性別研究建制化為例〉，發表於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主辦的「兩性平等教育」學術研討會。
- 陳佩英（2004年11月25日）〈認同實踐與知識轉化——以一所大學的性別研究建制化為例〉，發表於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一屆「亞太地區性別平等教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 當代編輯委員會（1998）《當代》，127期。
- Allen, Judith A. (1997) Strengthening women's studies in hard times: Feminism and challenges of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1&2: 358-

387.

- Allen, Judith A., and Kitch, Sally L. (1998) Disciplined by disciplines? The need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ission in women's studies. *Feminist studies*, 24(2): 275-299.
- Chen, Peiyong (2004) *Acting 'otherwis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omen's/gender studies in Taiwan universities*.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 de Groot, Joanna, & Maynard, Mary (Eds.) (1993) *Women's studies in the 1990s: Doing things differentl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erguson, Kathy E. (1993) *The man question: 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mport, Patricia J.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s to feminist scholarship*. Ph.D. disserta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 Gumport, Patricia J. (1990)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a vocation. *Higher education*, 20(October): 231-43.
- Gumport, Patricia J. (1991) E Pluribus Unum? Academic structure, culture, and the case of feminist scholarship.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15(1): 9-29.
- Klein, Julie Thompson (1996)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ies, and interdisciplinarie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McDermott, Patrice (1994) *Politics and scholarship: Feminist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cKenzie, Jon (2001) *Perform or else: From discipline perfor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 Messer-Davidow, Ellen (2002) *Disciplining feminism: From social activism to academic discours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ommers, Christina Hoff (1995) *Who stole feminism? : How women have betrayed wo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Weeks, Kathi (1998) *Constituting feminist subjec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陳佩英，美國南加州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博士，現為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教育政策與行政、比較教育、性別與教育。

〈聯絡方式〉

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

E-mail: [pychen@mx.nthu.edu.tw](mailto:pychen@mx.nthu.edu.tw)